

「保釣」集體記憶的起伏

——領土爭端、民族主義與世代的懷舊

蕭 阿勤

一、前言：研究範圍與問題意識

擁有領土，是國家的必要條件，以及每個民族主義的基本目標（Smith 1983: xiii）。領土主權爭議引發雙邊或多邊國家政府的衝突，也經常對這些國家內部的民間社會產生重大的影響。對於領土爭端，民間社會的態度與行動可能與國家統治者不同；民間社會不同部門或團體之間，也可能相異。從1970年代初期至今四十幾年以來，臺灣社會關於釣魚台列嶼（日本稱「尖閣諸島」）主權歸屬爭議或「保衛釣魚台運動」（保釣、釣運）引起的內部衝突，主要牽涉到族群與國族認同。例如2015年七月底，傾向台灣民族主義的前總統李登輝在日本演講後，對記者回覆「我講過好幾次了，尖閣諸島主權是屬於日本的，不是台灣的」⁽¹⁾引發當時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等「泛藍」陣營人士的強烈抨擊（包括總統馬英九親自投書報紙以指責）⁽²⁾。

事實上，臺灣社會關於釣魚台主權問題所反映的社會分歧，不僅在於國族認同衝突。釣魚台主權爭議與保釣運動綿延四十餘年，不同時期各有起伏而有不同展現，社會政治脈絡也不同。除了中華民國政府之外，其中也涉入民意代表、漁民、知識份子等眾多民間社會的行動者，而他們的訴求，不盡相同。70年代初在美國等海外地區，來自臺灣或香港的留學生發起了「保衛釣魚台運動」（簡稱「保釣運動」或「保釣」）。在臺灣，以國立臺灣大學

(1) 〈台灣朝野反駁李登輝釣魚台屬日言論〉，《BBC 中文網》，2015年7月26日，下載日期：2017年3月16日，網址：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7/150726_taiwan_lee_east_china_sea。

(2) 〈馬總統投書：釣魚台當然是中華民國領土 李登輝應道歉〉，《中國時報》，2015年8月3日，A12版，下載日期：2017年3月16日，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803000427-260109>。

學生與一群年輕知識份子為主，也隨後響應。70年代的保釣人士，尤其是在美國的臺灣留學生，大致可區分為三種立場取向：強烈批判國民黨政府而「支持中共、推動統一」的「左派」；強調「支持國府、革新保台」，同時大多也贊同中國統一而後來於1971年12月組成「全美中國同學反共愛國聯盟」（愛盟）的「右派」；以及追求「民主台灣、社會啟蒙」，認為「即使追求中國的統一，也應該基於台灣人民的利益與認同為基礎，真正的統一運動應該以台灣內部人民的要求為主力」的「第三條路線」（林孝信2010: 31-32；王智明2012: 98-100）。

與四十多年來地方民意代表、漁民等其它臺灣民間社會的保釣人士相比，70年代初國內外的保釣參與者，幾乎都具有高教育背景，擁有更多「文化資本」與論述能力，更能掌握社會發聲的管道。近年來，其中上述「左傾」又主張臺灣與中國統一的「左統」保釣知識份子，更是臺灣社會中建構保釣論述的主力，致力於維持關於釣魚台與保釣運動的「集體記憶」，並傳遞特殊的集體認同。

對於70年代初在海外與臺灣的保釣運動，既有的一手史料或二手研究都已有詳細描述（見下節文獻回顧的討論），本文不擬再重複敘述。本文所要探討的，在於70年代保釣運動由海外擴及台、港而消失後的四十餘年來的保釣現象，特別是近年來與知識份子有關的部分。本文的分析重點特別在於保釣左統知識份子，尤其運用他們所編纂出版、主要反應他們的觀點與立場的書刊等資料，聚焦於「懷舊」（nostalgia）與世代的集體記憶建構的關係，探討領土爭端與民間社會的關連，尤其是知識份子在「領土民族主義」（territorial nationalism）中的特殊角色與行動特質。不過本文雖聚焦於左統知識份子，但不完全局限在這個範圍，而是視論證所需，兼論其它立場者。

二、保釣運動的研究文獻回顧

從1970年代釣魚台主權爭議出現，40幾年來，各種關於保釣的文獻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目前臺灣保釣論述的主力所在，大都出自70年代海內外參與保釣運動的知識份子。這類文獻除了匯集當時國內外保釣運動的宣傳品、文章等之外，也加上他們的回顧，描述當時的運動經歷與感受，闡述運動的意義與理念等。這類文獻同時兼雜歷史資料與個人回憶，力圖呈現

當年的情景、見聞與歷程（例如林國炯等2001；龔忠武等2006；春雷系列編輯委員會2010；謝小苓、劉容生、王智明2010；鄭鴻生、王曉波2011；邵玉銘1991；邵玉銘2013等）。這類文獻包括台灣清華大學圖書館從2006年開始進行「海外留學生刊物暨保釣運動文獻」徵集、並訪談70年代保釣重要人物所得的資料。⁽³⁾以上這類文獻，是了解70年代保釣運動的史料基礎。其中的事後訪談與回憶等，更是本文藉以探討當時保釣參與者後續言論與行動的主要參考。尤其是屬於左統人士的資料與論述，例如林國炯、胡班比、周本初、葉先揚、龔忠武、王曉波、陳映真合編的《春雷》系列，正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對象。至於洪三雄（1993）的專書與張鈞凱（2012）的碩士論文，是目前對於70年代臺大保釣與學生運動較完整的描述分析，值得參考。任孝琦（1997）的專著講述美國保釣與「愛盟」的緣起及變化，更詳細提供了關於右派的發展歷史。

第二類的保釣文獻為學術研究分析，大多屬於歷史考據、國際法、國際關係、地緣政治等研究範圍。這類的研究文獻，作者來自台灣、中國、日本、美國等地，著重在法理上如何解決釣魚台爭議、各方應當如何主張對釣魚台的主權等。這類文獻的研究重點之一，在於列舉台、中、日各方的主張加以比較，從國際法角度來支持或反駁，試圖辨明主權的歸屬（例如丘宏達1975、1991；馬英九1986；張啟雄1993；林田富1999、2002；鄭海麟2003、2011、2013；黃兆強2004；黎蝸藤2014；Ma 1980等）。另外，從國際關係、地緣政治等角度切入者，則分析國際各方在釣魚台主權上的主張或行動之利弊得失，以及因此如何形成當前釣魚台爭議的局面等（例如翁明賢2012；國立政治大學當代日本研究中心2011；宋吉峰2013；林正義、陳鴻鈞2014；Downs and Saunders 1998；Su 2005；Chung 2004；Pan 2007；Koo 2009；Wiegand 2009；Kawashima 2013；Hook 2014）。以上第二類文獻，屬於二手研究性質，對於我們從國際層面瞭解釣魚台問題，相當有幫助。這類

(3) 見台灣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2008年5月），〈保釣暨海外留學生刊物典藏計畫訊息〉，下載日期：2017年3月16日，網址：<http://archives.lib.nthu.edu.tw/diaoyun/doc/newsletter001.pdf>；謝小苓（2010）。另外，中國清華大學圖書館於2007年9月開始接受70年代保釣運動人士捐贈的刊物與其它資料，並著手保釣、統運人士的口述訪談，其保存70年代海外保釣運動之記憶的方式，與臺灣清華大學圖書館類似。見中國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統運”資料〉，下載日期：2017年3月16日，網址：<http://lib.tsinghua.edu.cn/database/specialcollection/baodiao.html>；薛芳淪（2010：330-332）。

文獻事實上反映了以英語世界為主的國際學界對領土主權爭議的普遍研究趨勢與現狀，亦即偏重國家行動而相對缺乏領土主權爭議與民間社會兩者關係的研究。有少數研究文獻越出國家行動這個研究範圍，探討教科書、傳統媒體、網路社交媒體等對釣魚台主權爭議的建構（例如楊仕樂2014; Hollihan 2014; Wang 2017）。又如王智明（2012）、岡田充（2014）等人的零星研究文獻，曾批判那些從民族主義、國家主權角度宣示獨佔釣魚台的主張（見結論的討論）。不過，就整體的研究重點與問題意識而言，迄今的研究文獻相當忽略民間社會的行動者，尤其是知識份子領土爭端與領土民族主義中的角色，而這正是本文企圖貢獻的所在。

三、王曉波的例子與「過去」的意外重返

1968年夏、秋之間，東海富有油礦的消息出現，逐漸引發臺灣與日本關於釣魚台列嶼主權歸屬的爭議。兩年多之後的1970年11月，當時就讀於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的王曉波，以筆名「茅漢」與王順在《中華雜誌》發表〈保衛釣魚台！〉一文。他們兩人在文章開頭，引用中國1919年五四運動的口號「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沒有死心，準備奪取「屬於中國領土的釣魚台」。他們基於歷史文獻記載與地理位置，強調釣魚台列嶼屬於中國。但在1971年10月底聯合國大會預計表決是否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原由中華民國政府擁有的中國席位代表權前夕，中華民國政府的對外態度消極軟弱。這兩位作者同時指責日本「包庇『台獨』，挑撥在台中國人的感情」。在文章最後，他們強調「我們的上一代用『五四』運動來答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山東的企圖」，呼籲「我們要用力量和行動來證明，這一代的青年同樣具有保衛國土的能力和決心！」（王順、茅漢1970: 8-12）。

〈保衛釣魚台！〉應該是在戰後臺灣出生或成長的「戰後世代」所公開發表關於保釣的第一篇文章。在1971年1月底臺灣留美學生在美國首次舉行保釣示威遊行之前，這篇文章已由林孝信等人創辦的《科學月刊》轉載而流傳於留學生之間（宗育文1995: 35）。此後在1971年4月開始的臺大保釣運動中，王曉波即扮演重要角色，曾參與促成校內「保衛釣魚台委員會」（保釣會）的成立（洪三雄1993: 13）。在6月17日美國與日本簽署移轉琉球管

轄權（包括釣魚台列嶼在內）的正式文件當天，臺大保釣會發動校外遊行示威，並至美國、日本大使館遞交抗議書，王曉波是兩份抗議書及所散發的〈告全國同胞書〉的起草人（茅漢1971: 24；王曉波1996a: 352-355）。1972年5月15日，美國將琉球行政權移交日本，當時在臺大的保釣運動早已消沈。一週後的22日，臺大保釣會終於宣布解散，而解散啟事的起草人，也是王曉波。筆者的研究（蕭阿勤2010）曾指出，1971、1972年間保釣運動、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之後，許多20到40幾歲之間、包括本、外省籍的「戰後世代」年輕知識份子經歷「覺醒」過程而形成「回歸現實世代」。王曉波正是這個世代的年輕知識份子之一。

在美國投身保釣的臺灣留學生，彼此立場雖異，但幾乎都屬於外省籍（李子堅2006〔1978〕: 22；劉源俊1978: 46；水秉和1986: 65）。在臺灣的王曉波，也反映這種保釣運動參與者的省籍背景。他於1943年在江西出生，1948年隨家人來台，在臺灣成長。1979年底，36歲的王曉波出版了《時代呼聲》一書，在作者介紹中形容自己是「一個道道地地的真正中國人」。他在書中的序言回顧過去，強調「因保釣運動，我和許多台灣青年，真切的認識了現代帝國主義」。他認為自日據時期以來，「台胞的苦難，實為整個中華民族苦難的一部份。中國的苦難來自於中國的落伍及帝國主義」；「要解脫中國及台灣之苦難，必先解脫帝國主義的控制」，而這需要全民族團結與中國統一（王曉波1979: 1-2、6、14）。

70年代也是啟動臺灣政治、文化的「本土化」或「臺灣化」的關鍵時期。當時以本省籍人士為主的「黨外」政治反對運動開始顯著發展，以黃信介、康寧祥為首的「新生代」黨外人士要求重視臺灣現實、改革政治社會問題、實踐自由民主、保障臺灣國際生存空間。許多投入黨外運動的新生代，正是保釣與退出聯合國以來覺醒的年輕知識份子（蕭阿勤2010: 5-6）。在1979年12月9日所寫的《時代呼聲》自序中，王曉波強調「無論如何開明民主的政治都必須要有制衡。尤其是具有龐大官僚體系的現代政府，只有在接受廣大人民的監督下，才可能減少腐朽」。因此他認為「尤其『黨外人士』為努力於政治制衡的作用，又因本身有不可避免的錯誤，而付出了重大的犧牲，這是應予肯定的。但我仍期望『黨外人士』能自我超越現有的局限。以整個中華民族為前提，來促進政治的和平民主改革」（王曉波1979: 19）。不過，在王曉波寫下書序的隔天，就爆發了高雄「美麗島事件」。此後，政治反對

運動領袖身陷牢獄，使黨外的激進人士興起，提倡「台灣民族主義」理念。1986年9月「民主進步黨」成立後，臺灣民族主義運動更顯著發展。1988年，本省籍的李登輝繼承蔣經國，成為國民黨主席與總統，國民黨本身也逐漸「臺灣化」。1980、1990年代，更是臺灣政治與文化本土化、臺灣化的高峰（蕭阿勤2012: 3-4）。

至於以美國為主的海外保釣運動，起初並無明顯派系之分，但1971年夏、秋之間逐漸左傾，受左派主導。在國民黨推動下，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的右派人士，則於華府召開「全美中國同學反共愛國會議」，組成「愛盟」，與左派對抗。不過無論台灣國內、外的保釣運動，在70年代中、後期都已消沈。在臺灣，隨著1971年6月美、日就移轉琉球（包括釣魚台列嶼在內）管轄權簽約確定之後，之前4月時以北部大學生為主所發起的保釣運動就消失。在海外，當時保釣運動主要在美國，不少參與者後來回顧運動消頹的原因，大致都有相近的看法。例如左統人士林國炯認為在「天時已逝」方面，包括1971年10月聯合國大會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後中美關係改善、1972年9月中日建交後雙方擱置釣魚台列嶼爭議等。在「人和不繼」方面，林國炯除了認為由於保釣人士「走出校園，踏入資本主義社會」、1971年10月中國取得聯合國席位後保釣運動出現許多「機會主義者」而「使得釣統運隊伍良莠不齊」之外，更認為因為1978年所謂「改革開放」後揭露的「十年文革動亂」真相，打破「海外知識份子對祖國社會主義的憧憬與嚮往」（林國炯2001〔?〕: 674-681；參見水秉和1986: 66-68）。上述幾點固然為林國炯的個人見解，但大致說明了在美國以左派為主的海外保釣運動歸於沈寂的原因，也相當代表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左統人士對這個運動式微的理解與慨嘆，以及回顧保釣往事時某種「往者已矣」的心境。與此相應，伴隨左派保釣運動的式微，「『因敵人強大而強大』的『愛盟』，因此面臨了沒有敵人、沒有議題的窘困」，到了70年代晚期，「簡直是為辦活動而找議題」、「還要拉人頭充場面」（任孝琦1997: 151）。

在臺灣，以王曉波個人為例，也透露著類似海外林國炯所代表的情形。歷經上述臺灣70年代末到90年代的局勢變化，1996年秋，當時53歲、已擔任世界新聞傳播學院（後來的世新大學）共同科教授兼主任的王曉波，出版了《尚未完成的歷史——保釣二十五年》一書。其中除了收錄1970年他與

王順發表的〈保衛釣魚台！〉等早期文章之外，其餘在1980年代後的文章則在批判「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蔣經國到李登輝時期國民黨政府軟弱媚日而無作為、「黨外」到民進黨的「臺獨」及親日而擬放棄釣魚台的傾向等，並主張「非有統一而強大的中國無以制衡日本的侵略性格」（王曉波1996b: 295）。雖然這些言論的語調仍然昂揚，保釣與批判日本的熱情也未減，但王曉波此書以紀念「保釣二十五年」為名，在〈自序〉提到他的目的在於「把這些文字彙集成冊，為個人留下生命的紀念，也為時代留下歷史的紀錄」（王曉波1996b: 無頁碼）。回顧親身經歷的70年代初保釣運動，王曉波的自序，帶著緬懷往事的語調，流露了為歷史作結、告別過去的心境。事實上，在龔忠武、王曉波、陳映真列名為「共同主編」、於2010年6月出版的《崢嶸歲月·壯志未酬——保釣運動四十週年紀念專輯》上冊的前言中，王曉波即明白道出「我也曾把個人寫過的保釣文字編輯過一本《尚未完成的歷史——保釣二十五年》，本以為可以和保釣運動作一個人生的了結」（王曉波2010: 9）。

王曉波所言，相當能代表從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保釣人士回顧他們過往時的態度與心境。尤其是對左統人士而言，至少從70年代中、末期之後的80、90年代，是釣統運的「低潮」期（例如龔忠武2005: 2598）。70年代初保釣運動落幕後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光陰，放眼臺灣、美國及世界其它各地的保釣人士，不管是左統或其它立場者，在一種低潮的氣氛下，他們對保釣的回顧，大致零散而稀少，缺乏一致的努力與有組織的積極企圖，而是大多帶著個人的色彩，在緬懷往事的心情與氣氛下偶一為之。在某種為歷史作結的心境下，保釣人士——尤其是王曉波等左統人士，恐怕未曾預料到2000年左右以後包括他們本身會再度熱情投入、推動保釣的紀念與記憶建構（見下文的討論）。

上述保釣左統人士看待親身經歷的情形，反映了關於保釣的記憶在臺灣或海外的美國等地的傳播相當零落而淡薄。1994年夏，周本初應美國休士頓發行的刊物《北美行》主編邀請回顧海外保釣運動。他在以筆名「高原」發表的文章開頭，談到他的觀察與遲疑，指出「……至今在報刊上可看到的由參與過的人寫的記錄或回顧非常之少……。也許根本就是事過境遷，“春夢無痕”；再運動後的生活日子，又得眼睜睜地去應付……。這樣，在這十年運動裡，大約只能算是添為一卒的我，到底是寫還不是不寫呢？若寫，又怎麼寫呢？」（高原1994）類似地，在周本初後來與林國炯等人於1995年為

《春雷聲聲》所寫的〈序言〉開頭，他們提到70年代初保釣「轟轟烈烈」，但也隨即慨嘆保釣「今天卻似乎已經逐漸被人們淡忘了。除了有人寫過一些回顧之類的文章之外，未曾為它公開舉行過紀念會，也未曾為它寫過專論或出過紀念專書（釣／統運資料編輯委員會2001〔1995〕: 1）。

關於70年代初保釣運動的記憶淡薄，這對成長於70年代之後台灣的年輕世代而言，恐怕更是如此。1985年底，在紐約發行的《台灣與世界》雜誌舉行座談會，邀集在北美的一群70年代初積極參與保釣的人士回顧當年，其中包括當時左傾而於1971年9月首次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位臺灣留學生之一的王正方等人。座談中一位匿名的「N先生」說道：「這次接到『台灣與世界』來開這個會的通知時，我正碰到幾位剛從台灣來的留學生。他們對釣運一無所知，他們說他們從沒碰到過一個參加釣運的人」（王淪1986: 26）。1996年7月，「日本青年社」在釣魚台列嶼設置燈塔而再度引起臺灣官方與民間的抗議，「愛盟」也發表聲明（見下文的討論）。當時《聯合報》記者採訪兩位愛盟成員，亦即國民黨的海峽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焦仁和與新黨的立法委員郁慕明，這位記者指出：「愛盟的人多希望國人對釣魚台的立場能像他們一樣『同仇敵愾』，但有多少『新一代』的人也有這樣的想法？」⁽⁴⁾

不過，與1990年代中期之前相比，大約從2000年前後，各種關於釣魚台列嶼主權問題、回顧保釣歷史的活動、事件、書籍等，開始在臺灣密集出現。這些現象大略可分為：1. 研習營、研習會；2. 座談會、論壇、週年紀念大會；3. 出版書籍；4. 學術研討會；5. 演講；6. 遊行、示威、抗議、連署、陳情；7. 文獻徵集與收藏；8. 資料展；9. 成立組織；10. 記者會、發表聲明等。從主辦者的背景來看，首先，研習營之類的活動相當多，主要由於2012年之後，70年代以來在保釣立場上屬於「第三條路線」的林孝信等人，藉由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的「釣魚台公民教育專案」，在臺灣各地舉辦一連串的「認識釣魚台研習營」。就此而言，圍繞林孝信的一群人士，在近年來以舉辦營隊活動方式激起臺灣民間社會對釣魚台議題的關注、傳遞70年代保釣運動的記憶上，相當積極活躍。其次，學術研討會、座談會、論壇、

(4) 〈幕前幕後 廿五年前在美國，曾經積極反制左派學生 保釣一頁滄桑 愛盟幾許無奈〉，《聯合報》，1996年7月22日，03版焦點，下載日期：2017年3月18日，網址：<http://udndata.com/ndapp/Print?id=100419875&udnbid=udndata&date=1996-07-22>。

週年紀念大會之類，不少由原先左、右、第三條路線等不同立場者共同參與。這一方面顯示他們在呼籲關注釣魚台主權、追憶保釣運動上的態度基本相近。例如2007年五月在清華大學的「從新希望到釣運」小型座談、2011年12月在臺灣大學的「東亞視野中的保釣運動」研討會，王曉波、劉源俊、林孝信等人都出席。另一方面，這也反映了90年代之後左、右派對立的消解、甚至合作（見下文的分析）。

此外，愛盟原來的成員，是以各類活動企圖促使臺灣社會各方關心釣魚台問題、維繫保釣記憶的另一群積極行動者，其中主張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聯手保釣」的劉源俊尤為積極。他是2008年11月成立的「中華保釣協會」發起人之一與首任理事長，也是2013年7月成立的「臺灣釣魚台光復會」的首任理事長。再者，2001年秋《春雷聲聲》出版，接著相關的《春雷》系列厚冊出現，左統人士藉此宣揚其政治立場，也成為近年來臺灣社會中積極保存、傳播保釣記憶的另一股重要的力量。至於前面提到清華大學圖書館從2006年開始進行「海外留學生刊物暨保釣運動文獻」徵集工作，並訪談70年代保釣重要人物，因此成為臺灣保存保釣運動記憶的重要單位。

四、生命階段、懷舊與保釣記憶

2000年左右以來，參與過70年代初保釣運動者，特別是左統人士，他們積極推動保釣史料與口述回憶的蒐集、整理、出版，並舉辦各種相關活動等，雖有來自少數個人自覺推動的緣由，但事實上這同時來自超乎個人的因素。第一，保釣人士年齡相近，處於社會學家 Karl Mannheim 所謂相同的「世代位置」（generation location）與生命階段（Mannheim 1952 [1927]: 276–320；參見蕭阿勤2010: 16–24）；第二，90年代之後臺灣的統獨之爭加劇；以及第三，中國崛起為世界強權。換句話說，這種過去的意外重返，雖來自一些個人有意識而努力地建構關於保釣的集體記憶，但它實為個人生命歷程與歷史環境變化兩者匯聚而相互激盪的結果，亦即來自世代與時代的特殊交會。以下筆者藉助於心理學者 James V. Wertsch 對集體記憶、社會學家 Fred Davis 對懷舊的研究來分析這個現象。

首先，如同 Wertsch 所歸納的，許多心理學與社會學的研究都指出，對於過去的再現（representation）或集體記憶而言，不管人們親身經歷與否，

那些發生在他們成年初期 (early adulthood 或 young adulthood) 的事件極其重要。Wertsch 指出，在許多政治與文化議題的爭論上顯示，人們就發生在其一生當中的事件所形成的「自傳性記憶」(autobiographical memory)，對於他們理解過去特別重要；尤其是成年初期的經驗所形成的自傳性記憶，深受自我期許與認同所影響，常提供了某種「可使用的過去」(usable past) (Wertsch 2002: 38-40)。

不過為何人們的自傳性記憶的焦點在於成年初期？Davis 剖析懷舊情感與現象時的論點，雖然立基於西方社會的經驗，但值得我們參考。他認為，不管是對個人的或對社會集體的懷舊而言，懷舊的興盛，都是因為人們面臨變遷時在主觀上產生斷裂感與焦慮，因而渴求自我感的連續、維持認同。就個人的懷舊而言，Davis 從「生命週期」(life cycle) 概念出發，指出極少生命的轉型變化像青春期到成年期的情形這麼困難、漫長、又充滿重大的不確定。離家上大學、開始工作、服兵役、結婚、生子等，變化都相當顯著，因此形成與其他生命階段的鮮明對比、特別突出。這是為何這個時期成為人們後來懷舊的主要對象的原因 (Davis 1979: 8-9, 33, 47, 49, 56)。Davis 指出，如果人們的青春期到成年初期遭逢經濟衰退、戰爭、社會動亂等重大變化，或者流行品味與生活風格上顯著的轉變，那麼這個時期更容易成為人們後來懷舊的對象。他指出，青春期到成年初期普遍成為人們懷舊的焦點，而開始老化者 (the aging) 或老年人 (the aged) 則最常沉浸於懷舊，成為他們經常進行的「生命回顧」(life review) 的一部分 (Davis 1979: 60 (note 8), 64, 69)。

包括左統人物在內的保釣人士，在參與70年代初保釣運動時，大約在20、30歲上下，而如今都屆70、80歲左右。藉助於 Wertsch 與 Davis 的討論，從生命週期的角度來理解關於70年代初保釣的過去的意外重返，或者說關於這個過去的記憶建構的突然湧現，我們可以說，這是由於當時的保釣人士如今已屆最容易懷舊的老人生命階段。對保釣運動的追憶，是他們評估自我生命的「生命回顧」過程的一部份。而他們懷舊或「自傳性記憶」的焦點所在，也正正在於成年初期。首先，在這個時期，他們的個人生命面臨困難轉折與重大的不確定，而那些遠赴國外留學者更面臨適應異地求學與生活的各種挑戰。其次，釣魚台主權爭議與保釣運動做為政治的重大變化，發生於這段期間，而他們熱情投入，更使他們的成年初期烙印上深刻的歷史印記。

這種個人生命週期中的明顯轉折與突發性歷史重大事件的機遇性交會，使70年代初保釣運動容易成為那些親身經歷者後來懷舊的焦點，構成他們自傳性記憶中突出鮮明的重要部份。而近年來關於這個過去的重新挖掘，同樣也是生命週期與更大的歷史變化因素交會的結果，亦即來自他們個人的垂老與臺灣政治的本土化、中國在1990年代之後崛起的機遇性會合（見下文的分析）。

1978年，紐約華人刊物《新土》刊載李子堅回顧保釣運動的文章，歸納道「參加這一運動者，大致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他們大多是三十出頭的青年」（李子堅2006〔1978〕：22）。1995年4月，保釣人士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舉辦釣運25週年紀念會，籌備小組的公開信則提到「當年，我們只是二、三十歲風華正茂、意氣風發的青年人，而今已是五、六十歲的中年人了」（關文亮2010〔1995〕：213）。與會的黃瑞我當時如此描述：

一進會堂，人人都在找尋熟悉的影子。看來有的白髮斑斑，有的身廣體胖。有原來單身漢旁邊多了另一半，有原來形影相隨的已喪失了伴侶。年輕的變為中年人，中年人變為老年人了。可見人人都刻上了歲月的痕跡。雖大家多年不見，然從形態和口音，還能分辨或依稀記得。遺憾的是很多人無法趕來，不少人已分道揚鑣。總之，二十五年來，人事變了。不管如何，濟濟一堂，好不高興，暢談往事，其樂無窮。（黃瑞我1995：51）

前面提到林國炯等左統人士在1995年為《春雷聲聲》所寫的〈序言〉，談到編輯該書的緣由，明白流露出懷舊的心境。他們說：「想當年，保釣健將們正是二三十歲年華正茂、意氣風發的青年人，而今已是兩鬢班白的五六十歲的中年人了；有些人已經退休，進入老年；甚至有些已經去世……。撫今思昔，壯志未酬，不勝唏噓！」他們認為「倘若我們再不把握時光，趁自己精力未衰，記憶猶在之時，寫一點回憶，或收集或整理釣／統運資料，不但對自己的過去不好交待，也愧對我們的後人」（釣／統運資料編輯委員會2001〔1995〕：1-2）。到了2006年，相近的一批成員編輯出版《春雷之後》時，則更加坦承邁入老年的懷舊情感。他們的自述：

老年人都有兩個通病，一個是強烈的時不我與的迫切感，因為畢竟已經快走到人生盡頭了……

……我們是否應該趕快將這些已經走了的、或遲早也將要走的釣統運老兵的愛國事跡，用回憶錄、追思緬懷、口述歷史等方式留存下來、傳諸後世呢？

另一個通病就是喜歡往後看，看那曾經走過的坎坷道路，看那風雨飄搖的日子，看那崢嶸的歲月。我們老保釣最喜歡看的，當然是那段崢嶸歲月了。(釣統運文獻編輯委員會2006: 15-28)

上述左統人士的自述，可以說是懷舊的典型表現。首先，他們的焦點正在於前述的懷舊者本身恰逢歷史重大事件的成年初期。另一方面，強調投身保釣時的「坎坷道路」、「崢嶸歲月」等，這些也都如 Davis 進一步指出的，「懷舊喜歡專注於我們認為、感覺自己過去當中與眾不同的那些階段」，而這「……也許不在於我們過去真的特別，而是在於懷舊一直牽涉到面對新需求而要維持認同連續性的這種存在的問題，牽涉到我們走過生命週期時必須吸納不可避免的關係變化」，以及牽涉到要舒緩我們地位改變時的焦慮不安」。換句話說，「藉著反覆重提（也許重塑）那些『甜美的奇異』時光」，我們向自己保證自己雖然怪異、與眾不同、孤獨、疏離，但卻也完全不變、甚至更加提升 (Davis 1979: 40-41)。

除了上述左統人士編書序言的坦白流露，事實上，不分左、右派或其他立場的保釣人士所出版的書籍命名，都充分顯示這種懷舊情感，例如《風雲的年代——保釣運動及留學生涯之回憶》(邵玉銘1991)、《春雷聲聲——保釣運動三十週年文獻選輯》(林國炯等2001)、《春雷之後——保釣運動三十五週年文獻選輯》(龔忠武等2006)、《崢嶸歲月·壯志未酬——保釣運動四十週年紀念專輯》(春雷系列編輯委員會2010)、《釣魚台風雲》(王曉波2011)、《尋找風雷：一九七〇年代台大保釣學生運動史料彙編》(鄭鴻生、王曉波2011)、《愛盟·保釣——風雲歲月四十年》(愛盟2012)、《保釣風雲錄：一九七〇年代保衛釣魚台運動知識份子之激情、分裂、抉擇》(邵玉銘2013)等⁽⁵⁾「春雷」、「風雷」、「崢嶸」以及不約而同地頻繁使用的「風雲」

(5) 王曉波(2011)一書為1971年5月所出版同名書的重印，見雲天出版社(1971)。

字眼，大抵都在強調他們成年初期經歷在歷史上的重大突出，以及這段時光的甜美、奇異、與眾不同。這樣的標題修辭，也在於傳達某種歲月推移的滄桑感，亦即如 Davis 所說的，懷舊之所以具有維持認同的作用，因素之一，在於懷舊時人們對之前的自我產生一種欣賞的態度，推導出「看看我已經走得多遠」之類的自我評價，而這都來自將過去簡化與浪漫化 (Davis 1979: 44-45)。

不過懷舊不只涉及個人的自我認同，更在引發人們的集體認同上有重要作用，這對世代認同的出現而言，尤其如此。在這一點，Davis 的論點同樣深具洞見。他指出，懷舊經驗在定義一個世代時非常重要。懷舊對過去的事物做選擇、過濾、融合等，而這那些過去的東西從那些原本平凡的人口口合 (cohort) 中製造出一個可指認的世代，創造一種「我們」的連帶感 (Davis 1979: 101-102, 111-112)。事實上，在追憶保釣往事時，保釣人士正經常以保釣經驗來定義他們自己，自稱「釣運一代」、「保釣的一代」、「釣統運的世代」等 (陳映真 2006 [2005]: 11; 釣統運文獻編輯委員會 2006: 16、21)，流露集體的世代認同。

五、從消極失望到積極昂揚：保釣世代的重現

事實上，在談到一般的懷舊時，Davis 大致對它抱持負面的看法。不管是個人的或集體的懷舊，他認為都是用美好的氣氛包裝過去可能的痛苦等，呈現美好的過去、糟糕的現在的二分對照，而且「懷舊往回看，而非往前看，尋找熟悉的，而非新穎的，尋找確定的，而非在於發現探索」。他指出世代的懷舊情感的核心，是堅信過去完全比現在或未來要更好 (Davis 1979: 14-15, 108, 115-116.)。換句話說，在 Davis 的負面觀點下，懷舊者沈浸於美化的過去，雖然有利於維持自我認同，但多少有著規避眼前困境的傾向；面對眼前現實，懷舊的情感無意面對新奇與挑戰，並非積極昂揚地面對現在與未來，是一種退縮式的回應，而這對老人的懷舊而言，更是如此。但這一點對保釣人士，尤其是對左統人士來說，並非全然如此。這與 1990 年代初之後臺灣的統獨之爭加劇、政治與文化的本土化或臺灣化顯著進展有關，也與 20、21 世紀之交中國崛起成為世界強權有關，而這些局勢，更觸動了許多保釣人士的立場變化。

首先，70年代至今臺灣保釣的重要人物王曉波，仍然是一個顯例。從1970年11月發表〈保衛釣魚台！〉並積極投入1971年4月興起的臺大保釣運動，王曉波始終高倡民族主義、反抗美、日帝國主義、保衛中國領土，因此被批評「對中共存有幻想」等（王曉波1979 [1972]: 101；王曉波1979: 11-12；麥立1972: 54）。1972年1月，亦即臺大保釣運動已經衰歇半年多、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兩個多月後，新近獲得臺大哲學系碩士學位而擔任該系講師的王曉波，在《大學雜誌》上以筆名「麥立」發表文章，澄清自己做為知識份子的立場。他藉著與海外友人的通信對話，談到「誠如你來信說的『我是吃臺灣老百姓的血汗長大的，而不是吃「社會主義祖國」的奶水長大的，值此危疑震撼之時我絕不能背叛臺灣』」。他強調對於當前時局的基本看法，「第一是中國的統一，但統一中國的必須要是中國人所能接受的政權。第二是保護臺灣，使臺灣所發展的文化政治型態成為將來中國文化多方向發展的動力」。他接著批評海外留學生中的「臺獨份子」是「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工具」與「叛國組織」，認為「在政治理想上，國民黨還是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永不放棄統一中國的歷史使命。……因而我們可以證明國民黨政權之存在，有其超過『臺獨』之政治理想」（麥立1972: 54-56）。

此外，王曉波在文章中也如此批評海外留學生中「投機的左派」：

……一個由台灣人民供養出來的知識份子，不能擁抱臺灣一千五百萬農工大眾，何能去擁抱七億的中國農工大眾？不能愛能愛的一千五百萬在臺灣的中國人，何能去愛不能被愛到的七億中國同胞？……

……〔他們〕對臺灣是不負責任的。因為他們在臺灣吃喝了二十多年，並且把臺灣老百姓在他們身上投資的教育費一捲而逃，他們對臺灣老百姓還有沒償還的債務呢！他們自稱能感動於中共影片「一定要把淮河治好」，我認為這種感動是虛偽的，因為他們之中有人曾以特權的「歸國學人」身份回到台灣過，他們從來沒有「一定要把臺灣治好」的決心……

……實際上他們離開了臺灣，並且已決定不再回到臺灣，他們有什麼資格代表臺灣的居民決定臺灣老百姓的命運。……

……我要正告這些投機的左派份子，臺灣省一千五百萬人民決不可能作為投機者的政治資本，而且我們有決心抵抗任何形式的出賣！（麥立

1972: 54-55) (粗體為原文的強調)

上述王曉波批判海外保釣運動中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左派時，強調以臺灣、臺灣人民與內政革新及建設為優先等，這都充分代表前面所提到「回歸現實世代」的年輕知識份子的普遍傾向（蕭阿勤2010: 126-132）。

1973年初之後，國民黨逐漸壓制保釣運動以來以臺大師生為主的政治社會革新言論與活動。不過許多從保釣與退出聯合國以來覺醒的年輕知識份子，早已尋求更直接參與社會政治改革的途徑，包括投入年輕一代本省籍的民意代表黃信介與康寧祥所領導而顯著發展的黨外反對政治運動，成為黨外的「新生代」（蕭阿勤2010: 139）。面對黨外運動快速發展，如同前面提過的，1979年底，當王曉波回顧自己十年來的心路歷程時，他肯定黨外發揮的政治制衡作用與重大犧牲，但期望黨外能「以整個中華民族為前提」。面對1976年底中國十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78年底到1979年間「北京之春」的民主運動，他進而期盼「……海峽兩邊的民主潮流一旦合流，當即中國統一之日」（王曉波1979: 19-20）。上述以革新臺灣、建設臺灣為優先、以中國統一為遠程而次要目標，同時強調民主制衡的重要而以民主為中國統一的條件，批判中共而認為應由中華民國領導中國的統一等，都顯示從保釣開始的70年代中，王曉波做為回歸現實世代，與當時以美國為主的海外左傾的保釣留學生堅持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明顯的不同。

事實上，不少海外保釣左派人士後來在不同程度上反省或改變了原來激進的立場。前面提到，海外保釣運動在70年代中、後期已由盛而衰。而對許多左統人士而言，保釣進入「低潮」的原因之一，在於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後文革真相的暴露，動搖了他們原本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同。前面也提過，1985年底紐約的《台灣與世界》雜誌邀請北美一群保釣人士以座談方式回顧當年。當時一些參與者也提供明顯的例子，其中花俊雄談到：「我們以前認同共產黨，文革的種種，現在都造成了今天的尷尬。我們一心嚮往的文革，被中國徹底否定」。另一參與者于中原則說：「從浪漫愛國主義的運動中，我發現浪漫容易流於空洞、不實際。因為不實際，那時會配合國內文革打紅旗，變得教條」（王渝1986: 24）。再者，前面提過在1971年9月首次訪問北京的五位臺灣留學生之一的王正方，在座談中提到他與同行的王春生回來後所出版的《台灣留美學生在中國大陸的見聞》（王春生、王正方

1972) 一書時則說：「我和王春生以前合寫的那本書，我因為不是記者，所以不客觀，其中有許多溢美之詞，那是因為我先有了結論才去找證據的，是主題先行的。你如果把它當記者性的真實報導，那就錯了」。另一位座談會參與者「D女士」則說：「我想因為運動發展到後來，處處自動配合中國的步驟，替中國做宣傳，把中國說得好的不得了。一九七六年以後，中國對自己以前所肯定的，全推翻了，加以否定，這一來釣運中的人無所適從了，造成許多人的消沈失望」（王渝1986: 25-26）。又如1988年6月，任教於美國而同時為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項武忠，在《中國時報》副刊上發表文章，回憶保釣運動，對於「那時候，留美中國青年由於對台灣統治階級的不滿……，竟然開始懷疑西方對中共的報導，而且相信毛澤東是『人民導師』，大陸是『人間天堂』，他承認「到今天我還不能理解我們自稱理性的一群為什麼如此胡〔筆者按：原文如此〕塗！」（項武忠1988）

前面曾指出，大致從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是左統人士所自認的釣統運「低潮」期，同時也是關於保釣的記憶零落淡薄的階段。以上述海外保釣左派為例，他們對本身激進左傾的檢討，正出現在這個階段。不過，雖然有不少類似上述的自我反思，但在所謂的釣統運低潮期過後，許多左統人士在對當年保釣運動的懷舊中，同時重現積極昂揚的姿態，而這在90年代中期後尤其如此。前面提過，這與臺灣、中國的局勢變化有關。在台灣，1980年代上半葉以本省人為主的黨外積極宣揚臺灣意識及臺灣民族主義，1986年民主進步黨成立後80年代下半葉臺灣獨立運動快速發展，80年代末之後李登輝總統主政下的國民黨則開始「本土化」或「臺灣化」，而1990年代初新黨成立前後統獨之爭激烈，臺灣政治及文化也產生更普遍的本土化、臺灣化（參見蕭阿勤2012: 第四章；若林正丈2008: 第II部）。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鎮壓屠殺示威的學生與民眾後，邁入90年代，經濟繼續快速發展，並即將於1997、1999年分別取得香港及澳門主權，逐漸崛起為世界強權（參見王智明2012: 101）。

臺獨運動與臺灣政治本土化等發展，顯然使眾多保釣人士相當反感與警覺，而中國崛起，則使他們感到鼓舞。這對自認為處於釣統運「低潮」期的左統人士而言，更是如此。這種態勢，在1995、1996年之間展現得相當清楚。這兩年的一些事件，顯示臺灣的統獨之爭依然激烈，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關係的緊張，尤其促成這種態勢的發展。1995年1月底，中共總書

記、國家主席江澤民以「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為題的講話，其中被稱為「江八點」的主張，宣稱「努力實現和平統一，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決不是針對台灣同胞，而是針對外國勢力干涉中國統一和搞『台灣獨立』的圖謀的」（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8a: 369）。4月初，中華民國總統、中國國民黨主席李登輝以所謂的「李六條」予以回應，其中主張「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以來，台灣與大陸分別由兩個互不隸屬的政治實體治理」，「要解決統一問題，就不能不實事求是，尊重歷史，在兩岸分治的現實上探尋國家統一的可行方式」，並強調「大陸當局應表現善意，聲明放棄對台澎金馬使用武力」（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8b: 425-426）。

1995年又恰逢清廷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的一百週年，支持臺灣獨立的「教授協會」與許多社運團體於4月16日在臺北舉行「馬關條約一百年，告別中國大遊行」⁽⁶⁾。6月，李登輝訪問母校美國康乃爾大學，引發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滿，因而在7月向臺灣外海發射飛彈，並在下半年舉行一連串軍事演習，以威嚇臺灣。這一年也是中國對日抗戰勝利和臺灣光復五十週年，於是於1988年4月成立而主張「一個中國」、「兩岸統一」、「反獨促統」的「中國統一聯盟」（統盟）倡議，「新同盟會」主辦8月13日於臺北舉行的「我是中國人」大遊行，呼喊「中國一定要統一」、「打倒台獨，打倒獨台」等口號（李傑1995: 57）。接著，臺灣即將於1996年3月23日舉行戰後第一次的公民直選總統，國民黨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為李登輝與連戰，而民進黨的候選人彭明敏與謝長廷則以臺灣獨立的議題為競選主軸。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選舉前即開始又以發射飛彈及軍事演習恫嚇，引發臺灣危機，但李登輝仍順利當選。

夾雜在上述情勢變化中，1995年4月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舉行的保釣運動二十五週年紀念大會，可以說是代表左統人士準備走出低潮而重振旗鼓的明顯例子。前面提到，當時紀念會籌備小組的公開信提到他們已經從當年20、30歲青年變成50、60歲的中年人，流露出略帶傷感的懷舊情緒。不過，會後龔忠武在台灣統派刊物《海峽評論》通訊欄表示如此的感想：

(6) 見《台灣教授協會通訊》：2，下載日期：2017年3月18日，網址：<http://taup.yam.org.tw/comm/comm9505/tpdc5500.html>。

我們如期舉行了保釣紀念會，老朋友見面，分外親切。大家回顧昔日崢嶸歲月，恍如早〔筆者按：原文如此〕日，面對台獨，獨台氣焰猖獗，老保釣們都覺得應該重新振作，再出發，希望老保釣們寶刀未老，而且老而彌堅，可以對島內統派提供有力的支援。……物極必反，要統運再起，靠幾個老朋友的力量，起不了什麼作用，必須請台獨、獨台朋友幫忙，他們鬧得愈凶愈好，只有這樣，才會逼中國政府和海外華人一起起來聲討漢奸賣國賊。(7)

龔忠武的一番話，無疑透露了保釣的左統人士對民進黨代表的臺獨，以及對於被懷疑表面支持中國統一、但實則傾向臺灣獨立的李登輝所代表的「獨臺」，固然極其反感，但對兩者的憤慨，反而有利於他們走出釣統運低潮、重新振作再出發。當時在臺灣的王曉波給上述紀念大會的賀電也強調「在中華民族復興的前夕，國際霸權主義支持的台獨分離主義也加緊了步伐，妄想割裂台灣的中國主權……讓我們再次的團結起來，高呼：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台！保衛中國領土台灣省！」（關文亮2010〔1995〕：214）又如在美國任教的葉先揚在上述紀念大會也嚴厲批判「搞台獨、獨台的民族敗類」，認為「江八點」、「李六條」以及中國即將恢復對港、澳的主權，都開啟中國統一的進程，因此呼籲「我們老保釣及統運的戰友們，站在這個關鍵性的歷史時刻，對自己當年的理想……應該繼續堅持並且有所激勵，有所行動！」（葉先揚1995：55-56）紀念大會籌備小組成員之一的程君復也基於當時的新局勢，「希望『老保釣』朋友們煥發年輕時代的理想，為中國的富強和統一作出貢獻」（關文亮2010〔1995〕：216）。前面提到曾生動描述上述紀念大會現場情景的黃瑞我，談到會後返家途中的思緒，除了懷想當年保釣運動，則說道：「瞻望來日，大家覺得要多做些促進中國統一的工作。……想到中國富強就在眼前了，感到溫暖而高興，揚眉吐氣的一天快到了，精神為之一振，旅途的疲倦也全忘了」（黃瑞我1995：51）。

1995年前後，也正是林國炯等左統人士決心編輯出版當年保釣運動文獻資料之時（葉先揚2001〔2000〕：819-821）。前面提到，林國炯等人於1995年3月為《春雷聲聲》所寫的〈序言〉，曾感嘆70年代初海外釣／統運

(7) 見《海峽評論》：53（1995年5月），頁3。

被人淡忘，對當年保釣青年年華逝去，流露懷舊的傷感。接著在談到編輯該書的旨意時，林國炯等人則說道：「釣／統運動雖然暫時告一段落」，但其經驗「不但值得我們自己珍惜，也值得當代之人與後之來者的參考與借鑒」。他們認為：「如果中國領導人能夠早就重視海外保釣運動的經驗，也許就不會發生一九八九年六月的學潮與不安；也許臺獨和獨臺的氣焰不會像今天這樣猖獗……」（釣／統運資料編輯委員會2001〔1995〕：2）。林國炯等人接著強調「雖然已經事隔二十多年，釣／統運動仍然有其強烈的現實意義」，認為1995年正當釣運二十五週年、馬關條約一百週年、抗戰勝利五十週年、臺灣光復五十週年：

這幾個紀念日各自獨立，實則密切相關，薪火相傳。這個薪火，就是崇高的反帝愛國主義精神。我們保釣一代的炎黃子孫，在那個特定的時空條件下，幸逢其會，接下了這輝煌的薪火；我們有責任把它再傳遞到下一個世代龍的傳人。

有鑒於此，我們這幾個保釣老兵遂不自量力，在百忙中就手頭現有的極其有限的資料，匯集成編，作為對釣／統運二十五週年的獻禮。（釣／統運資料編輯委員會2001〔1995〕：2）

林國炯等人在這篇〈序言〉結尾感嘆「現在釣／統運適處於低潮」後，又相信「高潮總有一天會再次到來」。接著，他們重申編書的用心所在，認為在江澤民發表「江八點」後，「釣／統運朋友」們應該「還是一本初衷，在新的形勢下為促進中國的和平統一，重新出發，再上征途」（釣／統運資料編輯委員會2001〔1995〕：15-16）。

綜合來看，我們可以說，對臺灣民進黨為主的臺獨運動與李登輝領導下國民黨本土化等發展的憎惡，猶如一股推力，而對中國崛起的興奮則如拉力，都在90年代中期激發左統人士，使他們在對保釣運動懷舊之時，也覺得必須重振當年精神而再出發、再行動。加上「江八點」、「李六條」的出現等，上述1995年前後的局勢，正是林國炯等人決心開始編輯《春雷聲聲》的緣由，而這開啟了後來其它《春雷》系列厚冊的出版，亦即啟動他們積極建構關於70年代保釣運動的記憶的工作。

六、左右重合與懷舊極致

90年代中期開始，與上述左統人士的變化相呼應的，則是原來支持國民黨的保釣右派人士的轉變，而這同樣與臺灣獨立運動興盛及中國崛起有關。1971年9月，在密西根州安娜堡「國是大會」中，於芝加哥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的邵玉銘，與沈君山等人一起，與保釣左傾學生爭鬥，後來也參與1971年底「愛盟」的成立（邵玉銘1991: 63; 2013: 70-71、90-92）。大約從1985年底開始，邵玉銘在擔任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時，負責訪談愛盟成員，紀錄他們當年參加保釣的經驗，彙集成《風雲的年代——保釣運動及留學生涯之回憶》一書，於1991年中出版。這本書包括沈君山、吳建國、郁慕明、馬英九、張京育、陳長文、陳義揚、劉源俊、魏鏞、關中與邵玉銘本身等21人的追憶與感想，綜括來看，其基調都在於重申當年在美國保釣時的理想，亦即堅持反共愛國、反對臺獨、批判左傾投機份子、支持中華民國政府、追求自由、民主、和平下的中國統一。例如當時為國民黨立法委員的郁慕明，談到當年附和左傾份子者「完全將國家的尊嚴和個人的知識良心拋在一旁。看到這些人的行為，我深深替他們感到悲哀，感到恥辱」。他強調「海峽兩岸四十多年來的實踐證明，中國人不適合共產生活，事實既然如此，為何不致力於我們現有各種制度的改革，而不是因為不滿就反對台灣，去遷就大陸，變成政治立場的投機者」（郁慕明1991: 90、92）。

不過，1995年前後，以往左右派針鋒相對而難以相容的情況，開始有所轉變。1995年6月在臺北，以「台灣史研究會」名義主辦、由王曉波擔任主持人的一場「釣運二十五周年紀念座談會」，邀請了當年左右兩派人士參加。當時擔任空中大學校長陳義揚在會中說道：

愛盟這一批具有革命情感的朋友，回到台灣後大家各自在崗位上奮鬥，對於當時的革命感情仍相當懷念……不過到了民國八十年〔1991年〕，國內生態有很大的變化，解嚴黨禁報禁解除等政治情況，除了讓愛盟眼花撩亂之外，也使得我們不太能適應……到今天變成到底是愛那個國或者目標何在都不清楚，甚至愛盟的人都在政爭中被貼上非主流的標籤。……今天我們也許在不同崗位上有不同的表現，但最最重要的精神，就

像當年參與保釣的精神是一致的，那就是十個字——「只要有我在，中國一定強」。(宗育文 1995: 33)

陳義揚的這些發言，相當可以代表愛盟人士在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中臺灣政治自由化、民主化、本土化下所謂臺獨與獨臺並進的局勢中涉及國族認同與政治立場的認知與心境。王曉波在回應陳義揚的發言時說道：「我想今天在坐的朋友如果不保衛中華民國的話，台灣就變成台灣共和國了，所以不管怎麼說，只有保衛下去了」。他隨後又強調：「我想中國要統一，左右兩派就必須團結，要不然人家就告別中國……」（宗育文 1995: 33-35）。座談會中，曾在美國參與保釣運動的張世雄也如此說：

保釣當時保護的只是一個小島，而我認為台灣今天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則是，有一些人士想把台灣跟中國分離。依我個人理解，今天紀念保釣二十五週年，真正要注意的最大問題就是台灣獨立。
……像曉波今天辦的活動，把左右派拉進來是一個很好的溝通機會……所以左派愛國，右派也一樣愛國，大家應該攜手合作，了解我們真正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希望中國能夠和平統一。(宗育文 1995: 36)

前面提到，王曉波在 70 年代初臺灣保釣運動期間，嚴厲批判海外留學生中「投機的左派」與中共政權，堅持應由中華民國政府而非中共完成中國統一大業。直到 1979 年底美麗島事件前夕，他仍強調民主制衡的重要、肯定黨外對臺灣政治民主的貢獻、寄望海峽兩岸民主運動能合流。但很清楚地，90 年代中的王曉波，相較於大約二十年之前，已有明顯轉變，幾乎不談民主而只談統一，因此提倡左右團結。上述他所主持邀集的座談，反映了面對臺灣政局的變化，在李登輝領導的國民黨中逐漸被排斥而成為「非主流派」的許多愛盟人士，由於與保釣左派共享中國認同、中國民族主義、反對臺獨與獨臺，因此至遲在 90 年代中期開始趨向接受左右合作的可能。

70 年代初在臺灣保釣的王曉波與在海外保釣的右派愛盟人士，後來各有轉變而趨同，提倡左右合作，這種傾向在 1996 年釣魚台另一次的風波中，呈現得更加清楚，並具體指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作，而不只是與原來的保釣左派人士攜手團結。1996 年 7 月 14 日，日本政治性民間社團「日

本青年社」在釣魚台列嶼的北小島設置燈塔，引起臺灣及中國嚴重抗議。日本外相池田行彥於19日又宣稱釣魚台為日本領土，並於20日起實施兩百浬專屬經濟海域，釣魚台周圍海域被劃為日本領海。⁽⁸⁾當時為國民大會代表的愛盟主席陳義揚，隨即於21日以愛盟名義發表聲明，認為對此事「所有中國人均應予以最嚴厲的譴責」，強調愛盟要「督促兩岸政府切實負起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責任」，呼籲「兩岸捐棄成見、合力保衛釣魚台」。他強調：「今年三月間，中華民國台澎金馬地區舉辦首次民選總統，中共連續以軍事演習及飛彈試射威脅台灣的骨肉同胞；如今我們呼籲中共將砲口對準真正的敵人——日本，並以同樣的方式展現其維護領土完整及國家主權的決心」。⁽⁹⁾海基會秘書長焦仁和也以愛盟副主席的身分強調「兄弟鬩牆，外禦其侮」，認為兩岸中國人對此應有共同態度和立場，應摒棄歧見，對屬於中國人領土的釣魚台，表示積極、強硬的態度，主張中國人的尊嚴。⁽¹⁰⁾就這一點，前面曾提到當時報導愛盟聲明的《聯合報》記者，曾描述焦仁和以及當時已因反李登輝而脫離中國國民黨、參與新黨創立的郁慕明「……都希望中共也能為此事站出來，跟日本爭主權」。⁽¹¹⁾至於王曉波，則以筆名茅漢發表的文章中肯定「『保釣』二十五年後，『愛盟』終於能體會到必須兩岸團結，必須中國統一才能『外禦其侮』啊！中國人國共內戰，永遠只會使外國帝國主義漁人得利」（茅漢1996: 26）。

上述這些變化，王智明的研究已指出，亦即「歷經改革開放、解嚴與兩岸交流，釣運內的左右對立，到了1990年代事實上已經不再那麼尖銳了。改革開放所帶來中國崛起的大勢，對應著臺灣本土化運動而形成的藍綠分

(8) 〈日人在釣魚台設燈塔 我嚴重關切 駐日代表莊銘耀赴日本交流協會表達立場 中共指日侵犯主權 日方則稱尚無所悉〉，《聯合報》，1996年7月18日，01版，下載日期：2017年3月19日，網址：<http://udndata.com/ndapp/Print?id=100420986&udnbdid=udndata&date=1996-07-18>；〈新聞幕後「保釣」日本右翼團體再掀爭議 設燈塔 企圖製造支配權假象〉，《聯合報》，1996年7月19日，02版要聞，下載日期：2017年3月19日，網址：<http://udndata.com/ndapp/Print?id=100420714&udnbdid=udndata&date=1996-07-19>。

(9) 聲明的內容，見《海峽評論》：68（1996年8月），頁28。

(10) 〈愛盟籲兩岸政府共同「保釣」要求中共以對付台灣的武力威脅方式 把砲口對準「真正的敵人」日本〉，《聯合報》，1996年7月22日，03版焦點，下載日期：2017年3月19日，網址：<http://udndata.com/ndapp/Print?id=100419874&udnbdid=udndata&date=1996-07-22>。

(11) 〈幕前幕後 廿五年前在美國，曾經積極反制左派學生 保釣一頁滄桑 愛盟幾許無奈〉，《聯合報》，1996年7月22日，03版焦點，下載日期：2017年3月19日，網址：<http://udndata.com/ndapp/Print?id=100419875&udnbdid=udndata&date=1996-07-22>。

裂，使得老保釣們更願意放下左右意識形態之爭，共謀釣島主權的民族宿願」（王智明2012: 108）。左統的謝定裕後來在《春雷聲聲》的〈前言〉中也曾明白說道：「許多釣魚台運動的參與者，當年雖曾幫助國民黨做疏導的工作，現在卻是統一運動的主力」（謝定裕2001: 24）。

使得愛盟為代表的保釣右派人士有所轉變的因素，與前面所提到激發保釣左統人士在懷舊傷感之餘企圖重振旗鼓的原因，可以說相當類似，亦即一方面對發展中的臺灣民族主義、臺獨運動相當反感，另一方面在於出自中國認同、希望中國統一而對中國的崛起有所寄望。這個因素，使左統人士在重振當年保釣精神而準備有所行動時，更加寄望中國對臺灣民族主義、臺獨運動的壓制。就像前面提到1995年4月王曉波給哥倫比亞大學的保釣運動二十五週年紀念大會賀電高呼「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台！保衛中國領土台灣省！」所顯示的，對他們而言，藉助於中國的力量保衛釣魚台與打擊臺獨，可以說是一體兩面。就在這段期間，亦即歷經1995年6月李登輝訪美而引發中華人民共和國以發射飛彈及軍事演習威嚇臺灣，在1996年3月臺灣即將舉行戰後第一次公民直選總統而中國再度以同樣方式恫嚇臺灣之際，由陳映真以筆名許南村所主編的《戰雲下的臺灣》（林國炯等1996）在臺北出版。其中的作者林國炯、葉先揚、龔忠武、陳映真四人，在一年多前才完成《春雷聲聲》書稿的整理編輯（葉先揚2001 [2000]: 819-821）。《戰雲下的臺灣》的作者群，毫不掩飾地支持中國以武力奪取台灣。

《戰雲下的臺灣》反映了走出釣統運低潮而重振精神的左統人士，正呼應著1990年代以來在中國新興的民族主義浪潮。就在它出版兩個月後，亦即1996年5月，《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在北京出版，成為暢銷書。該書批判美、日，強調戰爭與武力是必要的，並警告台獨主張（宋強等1996a: 245），而陳映真擔任發行人的人間出版社隨即於同年8月刊行臺灣版（宋強等1996b）。王曉波擔任總編輯的《海峽評論》8月號，也以「編輯部」名義摘錄刊登該書與臺灣有關的部分（《海峽評論》編輯部1996）。這本書的作者群又在同年出版續篇《中国还是能说不》（宋強等1996c），而人間出版社也迅速於11月發行臺灣版（宋強等1996d）。這本續篇繼續抨擊台獨主張，又強調保釣「是兩岸中國人有無決心壓制日本軍國主義抬頭的試金石」，「是『遏制日本』的前哨戰」（宋強等1996d: 80-83、259-260）。

前面指出，臺灣民族主義、臺灣政治本土化發展，以及中國崛起，一推一拉而促使保釣左統人士再出發，激發林國炯等人編輯《春雷聲聲》，開啟其積極建構關於70年代保釣記憶的工作。後來其它《春雷》系列厚冊，包括《春雷之後——保釣運動三十五週年文獻選輯》三卷（龔忠武等2006）與《崢嶸歲月·壯志未酬——保釣運動四十週年紀念專輯》兩卷（春雷系列編輯委員會2010），雖不斷流露同屬一個世代的生命歷程而來的懷舊感傷，但由於正處在中國愈發成為世界強權、其民族主義更加強烈的脈絡中連續出版，因而他們的記憶建構或重構，也愈顯精神振奮、鬥志昂揚。在林國炯等人於1995年3月為《春雷聲聲》所寫的〈序言〉中，除了回憶盛讚包括他們本身在內的當年美國釣統運人士「高尚純潔的愛國主義精神，反帝精神和民族主義精神」與犧牲奉獻，更將他們與五年多前的六四天安門事件相比。林國炯等人除了指摘事件後流亡海外的民運分子的人格操守、識見胸襟「卑劣低下」，更抨擊他們是錯誤的，認為社會主義中國的體制「基本上是健康的，合理的」（釣／統運資料編輯委員會2001〔1995〕：8-9）。

到了2010年的《崢嶸歲月·壯志未酬——保釣運動四十週年紀念專輯》，在〈導言〉中，除了歡慶從編纂《春雷聲聲》、《春雷之後》時「缺人、缺錢、缺資料」到如今「隨著釣統運的聖火日益升溫亮麗」而「有人、有錢、有資料」、苦盡甘來，這些左統人士更進一步將當年海外保釣與中國文化大革命相提並論，稱之為「海外文化革命」，並將包括他們本身在內的左派「老保釣」與紅衛兵相比，稱之為「紅衛士」（春雷系列增編編委會2010：57-58）。這顯示左統人士更進一步企圖為曾經使釣運、統運陷入低潮的文革動亂真相翻案。他們認為紅衛兵「作為文革的先鋒軍，徹底清算中國近百年來長期形成的戀蘇情結、戀美和戀歐情結」，「並且以毛思想為基線，重建中國人的自我歷史和文化認同」（春雷系列增編編委會2010：58）。這群編者們描述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保釣左派，成長於六〇年代臺灣，但卻如饑似渴地學習毛澤東思想，而保釣是他們這一大批來自台灣的「紅衛士」發動的「海外的文革」，其目的與大陸文革一樣。因此他們肯定「投身於這場攸關民族命運、後世子孫幸福的偉大文化思想革命的老保釣，紅衛士，謂其青春歲月為崢嶸歲月，何謂不可！」他們更讚頌無私奉獻、平民性、戰鬥性、叛逆性等紅衛士的「嘉言善行、風骨操守所樹立的風範」，足以成為「中華文化和中國知識人和士人傳統的珍貴精神遺產」，垂範後世而不朽（春雷系列增編編

委會2010: 60–64)。(12)

這些自我謳歌，亦即強調個人成年初期經歷在歷史上的重大突出以及其甜美、奇異、與眾不同，可以說已達極致。這是人們在生命歷程晚期進行生命回顧時懷舊情緒的極度表現，也是對一貫的自我認同的極高肯定。在這種懷舊高峰中，批判六四民運、肯定文革與紅衛兵等，無疑也將個人對中國民族主義的信仰、對中國的集體認同推到高峰。如同筆者前面已指出的，70年代初的保釣運動出於個人生命週期中的轉折與歷史重大事件的機遇性匯合，使它成為保釣人士懷舊的焦點；而近年來關於這個過去的重新挖掘、記憶的建構，同樣也是生命週期與更大的歷史變化交會所致，亦即來自個人的垂老與臺灣政治本土化、中國崛起的機遇性聚合。王智明在討論1996年台港保釣人士登上釣魚台列嶼各自揮舞兩岸國旗是「象徵著中華民族主義的勝利」、「克服了內戰以來的左右分裂」與「兩岸和解的開始」時，曾直言：「只是，這個勝利是以犧牲中國內部民主，以及忽視台灣民族主體性為代價的」（王智明2012: 108）。他所說的，既適用於1990年代緩和對立而相互接近的左右派老保釣，更適用於近年來左統人士的保釣記憶建構。

七、結論：想像的領土、知識份子與懷舊中的記憶及夢想

處在所謂釣統運低潮期的1981年春，屬於左統、筆名「丁一」的謝定裕，曾如此回顧自己參與過的70年代初的美國釣運：

那是一個坦率、開放、無所顧忌的年代，雖然只有短短幾個月。毫不相識的，前一晚來個電話，就來過夜。打着地鋪，激動地談到三點四點。為了祖國的神聖領土，怎能不開誠佈公呢？「領土」應該是很具體的，現在想想其實也真是十分抽象的。（丁一1981: 76）

類似地，2009年項武忠在臺灣清華大學接受訪談、追憶保釣運動，提到「那

(12) 左統人士高漲的自我謳歌，與當時也親身參與保釣而左傾的李渝的說法，成強烈對比。李渝在1996年回憶時，批評保釣轉為統運是「從抗議一個政權轉到依附、擁護一個政權」，「人與人的疑猜鬥批」變成運動的重心，「路線」正確者打擊他人，使「釣運現出了它和文革的可懼的近似」，而「好在是在美國，否則摧殘已經執行，生命已經被毀滅了」（李渝1996）。

時候我們每個禮拜開會討論、唸書，我也不知道釣魚台在哪裡，出了事情，找到50年代聯合國調查報告講下面的油多少多少，我們不知真假，可是沒有道理再受日本人欺負」⁽¹³⁾如同謝、項兩人的回憶所反映的，那些遙遠、陌生、從未親睹或踏足的小島能激起當年他們如此的狂熱，事實上飽含抽象的想像。雖然領土與邊界是地理上的實質存在，但其本身與領土爭端的意義，原本即充滿筆者所謂的「想像的領土」(imagined territory) 的建構性質。George W. White 在研究比較東南歐的匈牙利人、羅馬尼亞人、塞爾維亞人的現有國家領土與國族認同的關係時曾指出，「大多數個人從未造訪他們所屬的社會團體的領土內的許多區域，特別是在國族的層次。然而，做為國族的成員，個人對他們的國族的領土，卻有著強烈的情感依戀」(White 2000: 33)。換句話說，國族做為 Benedict Anderson (1991[1983]) 所謂的「想像的共同體」，包括了相當根本的「想像的領土」的成分。釣魚台列嶼正是這種想像的領土的典型代表。數十年來，除了一些漁民、海巡執法人員與極少數嘗試登島的人物之外，涉入主權爭議的台、中、日各國中，事實上極少有人目睹或親臨這些小島。

上述「想像的領土」的現象，知名的人文地理學者段義孚在更早的時候已經清楚指出。他強調：「人們可以熱情依戀範圍廣袤的地方，例如一個民族國家 (nation-state)，而他們對這些地方少有直接的經驗，這是會製造象徵的 (symbol-making) 人類的特色」(Tuan 1977: 18)。換句話說，人們對想像的領土的強烈情感與主張，亦即與國族認同之類的集體認同有關的領域性或領土權 (territoriality) 宣稱，例如本文討論的領土民族主義，通常來自人們內化了這些領土所具有的象徵性的意義，將他們自己與這種象徵意義相連結。不過領土與領土爭端的象徵意義，與人類社會眾多其它事物的意義一樣，充滿「社會建構的」(socially constructed) 性質，是社會建構的結果，而語言論述在其中有著關鍵的作用。這種意義建構，正是擁有高教育背景、擁有豐富「文化資本」與論述能力、比較有能力掌握社會發聲管道的知識份子所擅長的。事實上，在世界的民族主義發展歷史上，誠如 Michael D. Kennedy 與 Ronald Grigor Suny 所言，相較於社會其他成員，在形塑人們對

(13) 見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釣運文獻館——1970年代台灣海外留學生刊物暨保釣運動文獻」下「口述訪談」(2009年5月3日)，〈項武忠院士訪談〉，下載日期：2017年3月3日，網址：<http://archives.lib.nthu.edu.tw/diaoyun/history/05.htm>。

於國族的理解、宣傳國族的價值、訓練人民的思維等方面具有最大能動性 (agency) 的，是知識份子 (Kennedy and Suny 1999: 2)。這種情形，清楚展現在 70年代參與保釣的知識份子上，特別是其中左統人士對領土與領土爭端的意義建構。他們的懷舊，清楚展現了這種意義建構的動態，以及他們在召喚過去、建構與維持記憶上，遠遠超出其他社會行動者（例如臺灣涉入保釣的地方民意代表、漁民等）的文化能力。

懷舊是記憶與夢想的混合。懷舊的記憶，並非往事的如實呈現，而是受夢想形塑下對過去的重新詮釋。因為交雜著夢想，所以記憶中的過去會不斷產生新的意義，而未曾實現的夢想，其意義也可能因此顯得更偉大美好。就像前面提過的，個人懷舊時通常將過去簡化、浪漫化而給予正面評價、欣賞過去的自己。歷經80、90年代所謂釣運的低潮與保釣記憶的零落淡薄，21世紀開始以來在臺灣，各種關於紀念保釣、傳播保釣記憶的活動、文章與書籍的大量出現，其基本驅動力來自於保釣人士的個人生命週期進入老年而進行生命回顧時高漲的懷舊情感。90年代中期以來，王曉波等人士由批判左傾投機到與保釣左統人士匯流，右派愛盟人士漸與左統人士相近而甚至相合，左統人士經過文革真相揭露等而消沈後又意志昂揚、甚至重新肯定文革、以海外保釣為海外文革、自比為紅衛兵等。在這些變化中，紀念保釣、傳播保釣記憶，都是他們深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崛起、臺灣民族主義運動發展與臺灣政治、文化普遍的本土化或臺灣化等情勢改變所影響，理解外在變局與自身在其中的位置後，對於保釣往事的再詮釋與再使用。

如同本文前面提過的，發生在成年初期的事件所沈澱而成的「自傳性記憶」，深受自我期望與認同所影響，常提供了某種「可使用的過去」，因而使相關的集體記憶帶有相當主觀、片面的色彩，也使所涉及的政治與文化爭論難分難解。比其他社會行動者更具有文化資本、習於在論述的宇宙中發揮想像的知識份子 (Kennedy and Suny 1999: 2)，也因為擅長召喚過去、建構集體記憶而可能成為傳承領土民族主義的主要行動者，成為領土爭端中相當不易妥協的民間社會的力量。近年來，台灣、中國、日本之間釣魚台列嶼的主權紛爭不斷加劇。各方關於「神聖領土」主權的宣稱，仍然基於民族主義與國族認同，而這在中、日之間尤然。70年代的保釣運動，以及晚近保釣人士的蓬勃懷舊，也是如此。在這樣的思維與行動下，那麼將如王智明所指出的，「保釣的結果只怕是戰爭而非和平、保釣的主體是政權而非人民」（王智

明2012: 109)。

2011年4月9、10日，由林孝信擔任籌備委員會召集人、世新大學主辦、清華大學圖書館與中華保釣協會協辦的「保衛釣魚台四十周年大會：保釣四十周年——理想還在召喚」，在台北世新大學舉行。當時《破報》記者劉美好觀察這場活動後認為「四十年後本土化認同已經佔了至少半數人口比例，因而當我聽見老保釣人以非常絕對的中國人認同強調其統派政治態度時，就因自己的台灣人認同而直覺產生不可避免的違和感——而這或許也正是台灣多數年輕人不可能進入保釣論述、進而關心保釣運動之因」。她又藉一位參與籌備的青年的意見批評「『這個島屬於中國』這樣從民族主義出發的『佔有』核心概念本身就有些父權色彩」，並強調應該從年輕世代重視的善待自然環境、資源永續分享的角度重新看待釣魚台問題（劉美好2011: 14-15）。王智明呼應劉美好所見，提倡「一種為了環境正義、尋求共生，而願意放棄民族本位優先性的思維」。他強調，「也許只有從要求和平、環保以及去國族觀點出發的保釣運動才能真正的保住釣魚台，也才能夠打破民族主義的魔咒走向一個互敬互重、對話合作的東亞」（王智明2012: 110-111）。

事實上，做為70年代以來保釣運動「第三條路線」的領軍人物，林孝信在2011、2012年之間反思當代「東亞變局下保釣的新意義」時，也指出「純粹的民族主義往往變成『各為其主』，極端者甚至會釀成傷害與侵略」。他認為「對內，保釣要與社會結合、要與民眾的需要以及社會的改造結合；對外，要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追求國際社會的平等、民主與正義」。林孝信強調，保釣的新方向與新意義，就在於結合、甚至促進東亞區域合作，至少追求民間合作的層次（林孝信2012: 21-22）。類似地，日本記者岡田充考察釣魚臺列嶼問題的歷史以及臺、中、日三國的主張，認為「領土民族主義的魔力，在於我們自我侷限於以國家主權為思考框架的『絕對價值』中」。而在如此排他性與絕對性的思考中，「我們」與「他們」的利益經常相反，國與國各持己見，只能二擇一而沒有第三種答案（岡田充2014: 15、23）。做為日本人，岡田充誠懇剖析2012年間日本官員支持「尖閣諸島國有化」的論調，精闢地道出受領土民族主義魔力吸引的典型心態：

這個魔力，首先以「也許會被奪取」來誘導出受害者意識，因而引人做出「不可以被奪取」的直覺反射式回答。換言之，這不是思考，而是一

種反射遊戲的關鍵詞。領土問題的關鍵處就在於它是沒有經過：「真是我們擁有的嗎？」或是「難道他們沒有理由嗎？」等多角度思考的反應。
(岡田充2014: 22)

岡田充呼籲：「應重新認識包含尖閣在內的東海海域，重視這裡曾有過豐富的共同生活圈歷史；並暫時擱置主權爭議，朝向資源共享的共同生活圈而努力」。唯有「將國家主權由『絕對化』轉向『相對化』的思考模式，才是擺脫『魔力』、得到自由的關鍵」，才可以看到「有希望的未來」(岡田充2014: 15、23)。

民族主義與國族認同建構的「神聖領土」觀念，無法解決釣魚台領土爭端、維持東海和平、追求東亞各國共生。這除了寄望於臺灣、中國、日本三個國家政府之間的協商之外，同樣重要、或甚至更重要的是有賴這些國家具有新見識的民間社會力量的連結合作，追求新的可能。

(本文另一個較長的版本，已發表於台灣出版的《臺灣史研究》第24卷第3期，2017年9月，頁141-208。)

引用書目

- 丁一 (1981) 〈釣運十年有感〉，《廣角鏡》106: 75-80。
- 王春生、王正方 (1972) 《台灣留美學生在中國大陸的見聞》。香港：文教出版社。
- 王渝 (整理) (1986) 〈保釣人聚首話當年〉，《台灣與世界》32: 19-27。
- 王智明 (2012) 〈1990年代後的釣運：兩岸保釣的交流與合流〉，收於劉容生、王智明、陳光興主編，《東亞脈絡下的釣魚台：繼承、轉化、再前進》，頁97-114。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 王順、茅漢 (1970) 〈保衛釣魚台！〉，《中華雜誌》88: 8-12。
- 王曉波 (1979 [1972]) 〈釋民族主義與中國統一〉，收於王曉波著，《時代呼聲》，頁100-105。台中：藍燈文化。
- (1979) 《時代呼聲》。台中：藍燈文化。
- (1996a) 〈尚未完成的歷史——論《中華雜誌》與保衛釣魚台運動〉，收於王曉波著，《尚未完成的歷史——保釣二十五年》，頁319-368。臺北：海峽學術。
- (1996b) 《尚未完成的歷史——保釣二十五年》。臺北：海峽學術。

- (2010) 〈前言〉，收於春雷系列編輯委員會編，《崢嶸歲月·壯志未酬——保釣運動四十週年紀念專輯（上）》，頁9-14。臺北：海峽學術。
- (編著) (2011) 《釣魚台風雲》。臺北：海峽學術。
- 水秉和 (1986) 〈保釣的歷史回顧〉，《當代》2: 62-72。
- 丘宏達 (1975) 《關於中國領土的國際法問題論集》。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1991) 《釣魚台列嶼主權爭執問題及其解決方法的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1998a) 《大陸工作參考資料》(合訂本第壹冊)。臺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 (1998b) 《大陸工作參考資料》(合訂本第貳冊)。臺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 任孝琦 (1997) 《有愛無悔：保釣風雲與愛盟故事》。臺北：風雲時代。
- 宋吉峰 (2013) 《釣魚臺「衝突」與亞太戰略安全》。臺北：秀威資訊科技。
- 宋強等 (1996a) 《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第一版)。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 (1996b) 《中國可以說不》(初版一刷)。臺北：人間。
- (1996c) 《中国还是能说不》。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 (1996d) 《中國還是能說不》(初版一刷)。臺北：人間。
- 李子堅 (2006 [1978]) 〈第一次釣運的回顧〉，收於龔忠武等編，《春雷之後——保釣運動三十五週文獻選輯（壹）》，頁17-35。臺北：人間。
- 李渝 (1996) 〈保釣和文革〉，《中國時報》，9月9日，19版人間副刊。
- 李傑 (1995) 〈生生世世做中國人：記「我是中國人」大遊行〉，《海峽評論》57: 57。
- 宗育文 (整理) (1995) 〈青春無悔話保釣：釣運二十五週年紀念座談會〉，《海峽評論》55: 31-37。
- 岡田充 (著)，黃稔惠 (譯) (2014) 《釣魚臺列嶼問題：領土民族主義的魔力》。臺北：聯經。
- 林正義、陳鴻鈞 (2014) 〈兩個「中國」在東海的油氣勘探與美日的角色〉，《遠景基金會季刊》15(4): 1-61。
- 林田富 (1999) 《釣魚台列嶼主權歸屬之研究》。臺北：五南。
- (2002) 《再論釣魚台列嶼主權爭議》。臺北：五南。
- 林孝信 (2010) 〈保釣歷史的淵源跟對海峽兩岸的社會的意義〉，收於謝小苓、劉容生、王智明主編，《啟蒙·狂飆·反思——保釣運動四十年》，頁24-46。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 (2012) 〈四十年來東亞變局下保釣的新意義〉，收於劉容生、王智明、陳光興主編，《東亞脈絡下的釣魚台：繼承、轉化、再前進》，頁17-22。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 林國炯 (2001 [?]) 〈論保釣統運的時代使命〉，收於林國炯等編，《春雷聲聲：保釣運動三十週年文獻選輯》，頁662-685。臺北：人間。
- 林國炯等 (1996) 《戰雲下的台灣》。臺北：人間。
- (編) (2001) 《春雷聲聲：保釣運動三十週年文獻選輯》。臺北：人間。
- 邵玉銘 (主編) (1991) 《風雲的年代——保釣運動及留學生涯之回憶》。臺北：聯經。
- (2013) 《保釣風雲錄：一九七〇年代保衛釣魚台運動知識份子之激情、分裂、抉擇》。臺北：聯經。
- 洪三雄 (1993) 《烽火杜鵑城：七〇年代臺大學生運動》。臺北：自立晚報。
- 若林正丈 (2008) 《台灣的政治：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戰後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 茅漢 (1971) 〈六一七學生示威紀實〉，《大學雜誌》43: 24-27。
- (1996) 〈釣魚台上再起風雲：一九九六保釣記〉，《海峽評論》68: 22-26。
- 春雷系列增編編委會 (2010) 〈導言：傳遞釣統運聖火·任重道遠——釣統運四十週年話滄桑·溫故開新〉，收於春雷系列編輯委員會編，《崢嶸歲月·壯志未酬——保釣運動四十週年紀念專輯》(上冊)，頁46-67。臺北：海峽學術。
- 春雷系列編輯委員會 (編) (2010) 《崢嶸歲月·壯志未酬——保釣運動四十週年紀念專輯》(上下冊)。臺北：海峽學術。
- 郁慕明 (1991) 〈走出自我的天空〉，收錄於邵玉銘主編，《風雲的年代——保釣運動及留學生涯之回憶》，頁85-93。臺北：聯經。
- 《海峽評論》編輯部 (1996) 〈書摘：中國可以說不！〉，《海峽評論》68: 58-61。
- 高原 (1994) 〈海外保釣運動的回顧〉，《北美行》第十九期，下載日期：2016年10月13日，網址：<http://www.lanxun.com/bmx/bmx019/nm01901.htm>。
- 翁明賢 (主編) (2012) 《止戈為善：釣魚臺爭議的和平解決》。新北市：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 馬英九 (1986) 《從新海洋法論釣魚台列嶼與東海劃界問題》。臺北：正中。
- 國立政治大學當代日本研究中心 (主編) (2011) 《保釣運動40年：釣魚台問題的歷史定位與東亞區域安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當代日本研究中心。
- 麥立 (1972) 〈評留學生的三種政治方向——給海外友人的一封信〉，《大學雜誌》49: 54-57。

- 張鈞凱 (2012) 〈世代與時代：1970年代台大保釣與學生運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
- 張啟雄 (1993) 〈釣魚台列嶼的主權歸屬問題——日本領有主張的國際法驗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2 (下)：109-113。
- 釣／統運資料編輯委員會 (2001 [1995]) 〈序言：把釣／統運的愛國主義薪火永遠傳遞下去〉，收於林國炯等編，《春雷聲聲——保釣運動三十週年文獻選輯》，頁1-17。臺北：人間。
- 釣統運文獻編輯委員會 (2006) 〈序言：編印釣統運文獻的甘苦〉，收於龔忠武等編，《春雷之後——保釣運動三十五週年文獻選輯 (壹)》，頁15-28。臺北：人間。
- 陳映真 (2006 [2005]) 〈突破兩岸分斷的構造，開創統一的新時代〉，收於龔忠武等編，《春雷之後——保釣運動三十五週年文獻選輯》，頁4-14。臺北：人間。
- 項武忠 (1988) 〈釣運的片段回憶並寄語青年朋友〉，《中國時報》，1988年6月2日，人間副刊。
- 雲天出版社 (編輯) (1971) 《釣魚台風雲》。臺北：雲天。
- 黃兆強 (主編) (2004) 《釣魚台列嶼之歷史發展與法律地位》。臺北：東吳大學。
- 黃瑞我 (1995) 〈時代列車在前進：參加紐約「保釣運動」廿五週年大會側記〉，《海峽評論》54: 51。
- 楊仕樂 (2014) 〈建構釣魚台爭議：台灣主要報紙的檢視1971-2012〉，《亞太研究通訊》12: 1-34。
- 黎蝸藤 (2014) 《釣魚臺是誰的？：釣魚臺的歷史與法理》。臺北：五南。
- 劉源俊 (1978) 〈我所知道的留美學生保釣運動〉，《人與社會》6(3): 41-52。
- 劉美好 (2011) 〈理想召喚了什麼？——保釣四十與當代台灣對話〉，《破周報》復刊656號: 14-15。
- 葉先揚 (1995) 〈世上無難事，只要肯攀登：保釣和統運的現實意義〉，《海峽評論》54: 53-56。
- (2001 [2000]) 〈編後記〉，收於林國炯等編，《春雷聲聲：保釣運動三十週年文獻選輯》，頁819-821。臺北：人間。
- 愛盟 (編著) (2012) 《愛盟·保釣——風雲歲月四十年》。臺北：風雲時代。
- 薛芳淪 (2010) 〈北京清華圖書館釣運資料典藏〉，收於謝小岑、劉容生、王智明主編，《啟蒙·狂飆·反思——保釣運動四十年》，頁330-332。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 鄭海麟 (2003) 《從歷史與國際法看釣魚台主權歸屬》。臺北：海峽學術。

- (2011) 《論釣魚台列嶼主權歸屬》。臺北：海峽學術。
- (2013) 《釣魚島新論》。臺北：海峽學術。
- 鄭鴻生、王曉波 (主編) (2011) 《尋找風雷：一九七〇年代台大保釣學生運動史料彙編》(全六冊)。臺北：海峽學術。
- 蕭阿勤 (2010) 《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第二版)。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2012) 《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臺北：聯經。
- 龔忠武 (2005) 〈國失英才，我失良友——深切悼念君復兄〉，收於龔忠武等編，《春雷之後——保釣運動三十五週年文獻選輯(參)》，頁2598-2601。臺北：人間。
- 龔忠武等(編) (2006) 《春雷之後——保釣運動三十五週年文獻選輯》(全三冊)。臺北：人間。
- 謝小岑 (2010) 〈台灣海外留學生刊物暨保釣運動文獻計畫〉，收於謝小岑、劉容生、王智明主編，《啟蒙·狂飆·反思——保釣運動四十年》，頁334-341。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 謝小岑、劉容生、王智明 (主編) (2010) 《啟蒙·狂飆·反思——保釣運動四十年》。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 謝定裕 (2001) 〈前言〉，收於林國炯等編，《春雷聲聲：保釣運動三十週年文獻選輯》，頁23-24。臺北：人間。
- 關文亮 (2010 [1995]) 〈懷念「保釣」，踵繼再起：紐約哥大釣運二十五週年紀念會盛況掠影〉，收於春雷系列編輯委員會編，《崢嶸歲月·壯志未酬——保釣運動四十週年紀念專輯(上)》，頁213-217。臺北：海峽學術。
- Anderson, Benedict (1991[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London: Verso.
- Chung, Chien-peng (2004)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Davis, Fred (1979) *Yearning for Yesterday: A Sociology of Nostalgi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Downs, Erica Strecker and Phillip C. Saunders (1998) "Legitimacy and the Limits of Nationalism: China and the Diaoyu Island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3): 114-146.
- Hollihan, Thomas A., ed. (2014) *The Dispute over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s: How Media Narratives Shape Public Opinion and Challenge the Global Ord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Hook, Glenn D. (2014) "Japan's Risky Frontiers: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nd Governance of the Senkaku Islands." *Japanese Studies* 34(1): 1–23.
- Kawashima, Shin (2013) "The Origins of the Senkaku/Diaoyu Islands Issue." *Asia-Pacific Review* 20(2): 122–145.
- Kennedy, Michael D. and Ronald Grigor Suny (1999) "Introduction." In Ronald Grigor Suny & Michael D. Kennedy, eds., *Intellectuals and the Articulation of the Nation*, pp. 1–51. Ann Arbor, MI: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Koo, Min Gyo (2009) "The Senkaku/Diaoyu Dispute and Sino-Japanese Political-economic Relations: Cold Politics and Hot Economics?" *The Pacific Review* 22(2): 205–232.
- Ma, Ying-jeou (1980) "Trouble Over Oily Waters: Legal Problems of Seabed Boundaries and Foreign Investments in the East China Sea." PhD diss., Harvard Law School.
- Mannheim, Karl (1952[1927])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In Paul Kecskemeti, ed.,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pp. 276–320.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Pan, Zhongqi (2007) "Sino-Japanese Dispute over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s: the Pending Controversy from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2(1): 71–92.
- Smith, Anthony D. (1983)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 Su, Steven Wei (2005)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over the Tiaoyu/Senkaku Islands: An Update."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36(1): 45–61.
- Tuan, Yi-fu (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Wang, Guofeng (2017)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Territorial Disputes: Foreign Newspaper Reporting on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s Dispute." *Social Semiotics* (published online: Feb 21): 1–19.
- Wertsch, James V. (2002) *Voices of Collective Remembering*.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hite, George W. (2000) *Nationalism and Territory: Constructing Group Identity in Southeastern Europ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Wiegand, Krista E. (2009) "China's Strategy in the Senkaku/Diaoyu Islands Dispute: Issue Linkage and Coercive Diplomacy." *Asian Security* 5(2): 170–193.

Summary

**Changing Collective Memory about the Defend
the Diaoyutai Islands Movement (*Baodiao*):
Territorial Dispute, Nationalism,
and Generational Nostalgia**

HSIAU A-chin

Territorial dispute between countries often has significant and lasting impact on civil society and different civil society actors usually have different relationship with territorial dispute. This article first gives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Defend the Diaoyutai Islands Movement” (*Baodiao*) in Taiwan and America.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over the Diaoyutai Islands (Senkakus Islands) in the East China Sea between Taiwan, Japan, and China emerged in the late 1960s. Over the last four decades, non-state actors devoting themselves to *Baodiao* included intellectuals, local politicians, fishermen, and so on, whose ideologies, interest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to defending the Diaoyutais are not necessarily the same. Among them, the intellectual-activists who pioneered *Baodiao* either in America or Taiwan during 1971, especially the “leftist-unificationist” members (*Zuotong*) who have strongly advocated Taiwan’s unification with China, have been most vocal in calling for the defense of the “Chinese” territory of the Diaoyutais since the turn of the new millennium in the context of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and “Taiwanization” in politics and culture. This article then explains why there has been an unexpected *Baodiao* memory boom created mainly by the leftist-unificationists in the recent two decades, highlighting their high cultural capital compared with that of local politicians and fishermen, nostalgic tendency typical of their late adult stage of life, the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and the rising of China as a global power. The article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many highly antagonistic leftist and rightist members of *Baodiao* intellectual-activists have since the mid-1990s reached rapprochement because of their shared Chinese identity, opposition against Taiwanese nationalism, and support for the rising China, thus echoing China’s new nationalism.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high capability of these intellectual-activists in constructing

collective memory, as demonstrated in their nostalgia for the *Baodiao* past, shows that they have been one of most unyielding civil society actors demanding to defend the Diaoyutais,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gents of territorial nationalism, which arguably must be overcome in order to solve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over the Diaoyutais, maintain stability in the East China Sea, and achieve peaceful coexistence among Taiwan, China, and Japan.

Keywords: Diaoyutai; Defend the Diaoyutai Islands Movement; Baodiao; Territorial Dispute; Nationalism; Intellectuals; Nostalgia; Generational Memory